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

胡德坤 主编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 中国与世界研究

第四卷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彭敦文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

胡德坤 主编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第四卷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彭敦文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第4卷,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彭敦文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胡德坤主编
ISBN 978-7-307-07346-3

I. 反… II. 彭…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研究
②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K152 ②D829.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4102 号

责任编辑:黎晓方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5 字数: 357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7346-3/K·423 定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的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是将人类从法西斯侵略与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正义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既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也决定着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是过去任何一个事件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最先站起来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在世界上开辟了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主战场之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而为推动世界历史从动荡与战争的旧时期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中国历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独立解放与和平崛起的起点与开端。

由此可见，中国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密不可分整体。但在国际学术界，战后由于西方冷战思维和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更有个别战争发起国对侵略战争缺乏反省，使得美、英、苏、日等国的大多数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对中国战场很少提及，对中国战场的作用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还加以贬低、歪曲。因此，研究与探讨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厘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便成为中国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出于上述考虑，本课题组设计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攻关课题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本课题力图对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最终成果为一部九卷本的著作，书名为《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本书按内容分为九卷。第一、第二、第三卷主要从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中国抗日战争与美英东亚战略、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等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第四、第五卷主要探讨战时中国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卷主要探讨战时美、英、苏、德等大国的对华政策。本书的九卷是从不同角度探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关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同一般的研究丛书是不同的。

本书的出版是集体智慧和辛劳的成果。本课题组由武汉大学校内外同行 20 余人组成，其中许多人是著作等身的专家，已有丰富的学术积累，为完成本课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书在主编确定编写指导思想、编写要求、编写大纲的基础上，各分卷分头执笔撰写。成稿后先由各分卷作者审稿，再经主编审稿、集体审稿修改、主编终审，最后交付出版社。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齐世荣先生。齐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领军人物。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齐先生发表的论文《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世界历史》，1987 年第 4 期），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与国际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证，代表了我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本课题得到了齐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本书成稿之际，齐先生又欣然应允将《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作为本书代序，从而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参加本书编写人员的工作已在各卷出版后记中说明。此外，在本课题早期阶段，罗志刚教授、熊伟民教授分别承担了第八卷、第六卷的大纲编写和部分资料准备工作；武汉大学吴友法教授、向荣教授、严双伍教授、杨泽伟教授、潘迎春副教授等，参加了课题的

申报论证、每年一次的学术研讨会、提供资料等工作，特此致谢。本课题于2006年3月正式启动，历时三年有余。课题组成员大多是各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或骨干，肩负重担，但大家都能克服困难，完成书稿，实属不易。作为项目主持人，我由衷地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

本课题从申报、开题、编写、定稿到出版，得到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武汉大学校党委和校行政，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历史学院、世界史所、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边界研究院、武汉大学出版社等单位的指导和支持；陈庆辉社长，刘爱松副社长，陶佳珞分社长，责任编辑王军风、杨华、朱凌云、黎晓方、李琼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课题组各成员的家人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课题组一并致谢！

从主观愿望来看，作者力图完整收集和运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中文资料以及英、日、俄、德等外文资料，写出一部能代表当代中国学术界水平的专著。但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精心打磨，书稿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加之书稿是以问题展开的，有些地方内容有重复与交叉现象，很难完全达到预定目标，恳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胡德坤

2009年10月3日中秋节于珞珈山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策略及其困境	9
第一节 申诉政策与依赖国联	9
一、不抵抗政策的实施与申诉政策的确立	10
二、国联和英、美处理事变的立场	22
三、国民政府坚持申诉政策	33
第二节 申诉政策与直接交涉	41
一、事变处理初期的中、日直接交涉主张	41
二、申诉政策的困境和中、日直接交涉主张的再度抬头	53
三、申诉政策的继续实施与上海停战交涉	64
第三节 外交的困境与申诉政策的终结	75
一、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	75
二、国际和中国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基本反应	85
三、《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与国民政府申诉政策的终结	94
第二章 国民政府摆脱外交困境的各种方案及其实施	107
第一节 有限抵抗与军事停战	107
一、有限抵抗政策的形成与实施	107
二、有限抵抗的失利与直接交涉政策的抉择	117
三、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与停战交涉	126
第二节 退让政策及其影响	135
一、《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的善后交涉	136
二、《敌乎？友乎？》与对日亲善政策	144

三、亲善政策的实施与华北“纠纷事件”交涉	157
第三章 阻止日本分裂和控制中国的强硬外交政策	171
第一节 阻止华北分治的外交运筹	171
一、国民政府阻止分治的对内政策	171
二、国民政府阻止分治的外交运筹	181
第二节 中日关于“广田三原则”的交涉	189
一、“广田三原则”的提出及其交涉过程	189
二、国民政府应对“广田三原则”的外交策略	198
第三节 推动国际合作以抑制日本侵华的外交举措	209
一、国民政府的大国合作思想	209
二、华北事变前的中外经济合作	218
三、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中外经济、 政治合作的推动	228
第四章 抗战初期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239
第一节 和战转换与外交运筹	239
一、“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的交涉政策	239
二、从交涉政策到积极应战的转变	246
三、积极应战中的其他外交运筹	257
第二节 增强抗战实力的外交举措	267
一、加快发展中苏关系	267
二、陶德曼“调停”前后中立德国的举措	277
第五章 走向长期抗战中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288
第一节 国民政府立足于长期抗战的外交政策	288
一、全球视野下的外交思考	288
二、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诱和、诱降的政策	295
第二节 加强对欧美国家的外交	305
一、争取英、美、法等国的支持与援助	305
二、重点推动国联和英、美、法转变对华政策	312

第六章 苦撑待变与欧战爆发后的对外政策·····	323
第一节 苦撑待变·····	323
一、坚持抗战与揭露日本扩张政策的图谋·····	323
二、外交因应与逐渐以美国为外交战略重点·····	332
第二节 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344
一、欧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的外交抉择·····	344
二、困境中的外交筹划与实施·····	354
三、争取援助与积极推动反法西斯国际合作·····	364
本卷综论 “自存”与“共存”·····	376
主要征引及参考资料·····	383

引 言

本课题研究“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国民政府为解决中日矛盾所进行的外交筹划，包括对外政策的基本思路、政策制定、内容及其实施。故名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开始突破华盛顿体系所形成的远东均势，企图将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并进而与美、英、法、苏争夺远东霸权。由此肇始，远东国际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和变化莫测。加之以德国的重整军备，国际形势呈现风云变幻的形态。在变幻莫测的远东局势以及国际形势背后，一般来说，起支配作用的是三大矛盾，即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最具侵略性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它们威胁和侵略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日渐演化，使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最后形成阵线分明的国际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这一矛盾演化和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过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局部战争走向全面战争进而空前扩大的历程。这一历程构成世界现代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段。这一时段上，中国作为最先受到日本侵略威胁的国家，外交上所遇到的严峻挑战前所未有，备尝艰辛。而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则依据自己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解和把握，围绕抑制、抗击日本侵略，支撑中国抗战，不断调整对外政策，应付着日本侵华及相关国际形势的各种变化，为争取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外交基础。

国民政府这一时段的外交努力，涉及面广，内容丰富而变化复杂，是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整体中的重要部分。将这一时段国

民政府的外交努力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题的描述和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主要是抗战整体历史视角所致。从抗战整体历史视角来看，“七七”事变作为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将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中国应对日本侵华的整个过程，区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即局部抗战阶段和全面抗战阶段。而全面抗战阶段，通行的做法是将其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小的阶段。^①这样，欧战爆发、苏德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中具有标志性，且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被包含在整体的抗日战争历史之中，而没有作为划分中国抗战阶段的标识。这一阶段划分模式突出中国自身抗战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及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立论有据，理所当然应该是中国抗战历史研究者采取的主要模式。

但是，中国抗战不同方面内容的历史发展，各有其受本身内容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线索及其阶段性。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莫不如是。就国民政府的外交而论，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以“七七”事变为界限，可分为交涉政策为主和抗战外交两个阶段。其中，抗战外交又可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限，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中国处于单独承担抗击日本法西斯重任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上，外交的中心内容是争取抗战援助和推动建立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同盟；后一阶段，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英、美、荷、澳等国成为抗击日本扩张的同盟者，外交的中心内容则是以协调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关系、争取打败日本和建立战后和平秩序为主。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三个阶段之中，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抑制和抗击日本侵略视角来看，中国与英、美等大国的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美等大国面对日本的侵略扩张尽管也曾给中国一些道义支持、物资援助，甚至战略性的协助，但总体上是以妥协退让、观望游移为主，与此后英、美等国投入抗击日本侵略完全不

^① 对于中国战场有无战略反攻阶段，学术界的见解不一。

同。此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正式对德、意、日等法西斯阵营宣战，一方面中国正式融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另一方面中国反对和打击日本法西斯的事业也正式成为世界民主阵线共同的事业。而这一变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根本改变了太平洋战争之前国民政府外交的被动局面。因此，将“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国民政府外交视为一个整体，可展现与英、美、荷、澳等国形成同盟关系或正式融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之前，国民政府以中国自己的力量处理中日矛盾的整个过程。

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外关系或国民政府外交作为整体来看待，进行专题研究，尽管不是学术界的通行做法，而以这一视角展开的真正研究也少见，但也不乏尝试者。如徐蓝著《英国与中国抗日战争（1931—1941）》、孙有利著《中国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等。^①徐著利用中、英、美、日档案和文献史料，较为详细地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英国政府对中日问题的态度、政策与措施的变化，以及对华、对日政策的发展。重点揭示了面对日本对华的侵略扩张，中、日、英三国间的互动关系。而对国民政府以对日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该书也有基本的直接梳理与论述。孙著则以1931—1941年中国外交政策为研究重点，认为研究这一阶段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单纯从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一角度考虑，而应注意中国对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预期和判断，这些基本判断极大地影响具体外交策略的制订，甚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国内政治。在这一基本认定的基础上，该书作者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和国际关系理念的转变，认为由于认定日本与列强间的冲突越来越不可避免，国民政府联合列强抗衡日本和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建立抗日同盟的诉求也不断增强。孙著将战略性理念与国际局势、国内变化相结合来分

^① 徐蓝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5）》，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Youli Sun: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1 ~ 1941)* , St Martin' s Press, New York 1993.

析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展示国民政府从理念到决策以至实施的内在关系，是值得肯定的。

如上所述，“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通常以“七七”事变为界限被分成两个阶段。受这一模式的影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一部分集中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时段的国民政府外交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则包含在战时外交的研究成果之中。

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时段的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研究，开展得早，也较为充分。抗战开始以前，周开庆就有《1936年之中日关系》（该书1962年在台湾再版时更名《抗战以前之中日关系》）一书问世。该书虽以1936年的中日关系为主，但对“九一八”事变以后至1936年以前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有较完整的论述，并兼及其他对外政策。稍后，吴颂皋有《十年来的中国外交》长文（收在《抗战前十年之中国》一书中）具体论述1927—1937年国民政府对外政策，且以“九一八”事变后的对外政策为主，而其中又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周书以史述为主，吴文侧重于政策评论，且距研究对象的时间很近，则都不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除周、吴的相对全面的研究以外，一些国际法、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知名专家，甚至一些社会名流，也发表了不少对国民政府某项对外政策进行研究和评论的文章。当时一些著名报刊上，都不乏对国民政府对外政策进行评论的文章。比较集中地发表这类文章的刊物有《外交评论》、《外交月报》、《外交周报》等。这类文章庞杂而零碎，在此就不一一列举。抗战开始以后，对外政策的评论文章，时见报刊，但都属评论之类。此后以迄于20世纪60年代，有关“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研究论著较少。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外关系史、日本侵华史和抗战史研究的发展，研究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论著不断增多。由于这一时期对日问题是国民政府外交的中心，因而，多数专题论文、论著都以对日政策为论题展开，兼及对英、美、德、苏等大国的政策；而以国民政府对外政策或外交为论题

的，也不乏专论。^①

① 这类专题论文不少，在此不一一列举。较为重要的有：李退遇 《蒋介石反动政府在“九·一八”时期的卖国活动》，《史学月刊》1958年第9期。于永志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依赖国际联盟的骗局及其破产》，《史学月刊》1965年第1期。陈崇桥 《九一八事变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韩明华 《一·二八抗战与不抵抗主义》，《上海师范学报》1982年第4期。李云汉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总统的对日政策》，（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六编（上）。郭大钧 《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齐福霖 《“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王崧 《一九三五年德国对调解中日关系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蒋永敬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台）“军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魏宏运 《“不抵抗主义”剖析》，《文史哲》1987年第2期。蔡德金，杨立宪 《陶德曼“调停”初探》，《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王宜仁 《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吴景平 《试析国民党转向抗日的经济原因》，《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陈鸣钟 《9·18事变爆发至〈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期间的蒋日关系》，《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郑会欣 《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李义彬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陈鸣钟 《试论1935、1936年中日会谈》，《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吴首天 《论希特勒的对华政策（1933—1941）》，《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任骏 《蒋廷黻与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俞辛焯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重性评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杨晨 《何应钦与华北交涉（1933—1935）》，《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刘建武 《一二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的调处活动评析》，《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金冲及 《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黄鸣，李士成 《华北危机与国民政府对日交涉方针》，《民国档案》1995年第4期。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李良玉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外交》，《江海学刊》1996年第2期。宗成康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外交析评》，《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余子道：《敌乎？友乎？——三十年代关于中日关系的一场论争》，《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2期。鹿锡俊 《1932年中国对苏联复交的决策过程》，《近代史研究》

对战时外交的研究，包括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在内的专题论文和专著都不少。以专题论文而论，对国民政府外交做出整体论述且较为重要的有：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和《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两文。两文在全盘把握的基础上，对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论述。认为，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苦撑待变的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从这一战略出发，国民政府对德国、苏联、英国、美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其政策方针是：中立德国，不使之为敌；联合苏联，争取军援；依靠英、美，力促其变。这一外交方针是基本成功的，尤其是撇开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从国家安全利益上找到了与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形成了共同对抗日本的阵线。对于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疑虑和担心，文章做了较为细致的揭示：欧洲局势的稳定或剧变皆非国民政府所追求的目标，由稳定或剧变所造成的阵营分野才是国民政府真正关注之所在。^①整体上把握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需要宏大的国际视野和对国民

（接上页）2001年第1期。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仲华《“九一八”至“七七”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转变评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鹿锡俊《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相比于丰富的专题论文，专题著作则较少。仅有考布尔（Parks M Coble）著：《面对日本：中国政治与日本帝国主义（1931—1937）》，纽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鹿锡俊著《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政策（1931—1933）》，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彭敦文著《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

① 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王建朗《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除王建朗的论文之外，整体论述战时外交的还有曹学恩《试论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政府外交的深入理解，专题论文除王建朗两文之外，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对某些具体问题和某些重要中外关系的专论。这些专题论文之中，颇受学术界关注的是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的“和平交涉”问题。这方面沈予、杨天石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二人利用中、日文资料所做的考察使人们对迷雾重重的“和平交涉”有了较为真切的了解。^①除此而外，有关中苏、中美、中英、中德关系的专论也屡屡见诸学术刊物，使有关问题或得以澄清，或扩大资料运用使结论更为确实，不一而足。大多着眼于两国关系，非纯粹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角度进行论述。^②

除数量不少的专题论文之外，还有一些专著大量涉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政策。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任东来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

① 沈予：《论抗日战争时期日蒋的“和平交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孔祥熙于抗战期间终日秘密交涉》，两文均见杨天石著《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沈予：《抗战期间孔祥熙、宇垣一成中日秘密议和》，《百年潮》2007年第12期。两人对“和平交涉”性质的看法有差异。沈认为体现国民政府的妥协；而杨认为国民政府是借此了解情况，虚与委蛇。

② 徐蓝：《布鲁塞尔会议与中日战争》，《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王真：《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初探》，《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朱坤泉：《重庆国民政府与1941年的美日妥协谈判》，《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王真：《孙科与战时国民政府的对苏关系》，《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张北根：《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王真：《〈苏日中立条约〉与战时中国》，《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武菁：《从德国公布的外交档案看三十年代的中德关系》，《民国研究》1995年第2辑。陈晋文：《法国军事顾问团来华与抗战前期中法关系》，《民国档案》1998年第2期。王建朗：《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一以抗战前期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王桧林：《“抗战无底论”与“不降必胜论”想说什么？——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剖析》，《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左双文：《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王洪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罗志刚著《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等，是较具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对全面掌握抗战时期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裨益良多。

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乃至抗战结束，是国民政府外交经历艰难和走向抗战胜利的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际阵营分化不明朗，变数很大。如何认识和把握国际形势发展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趋势，并根据自己的判断，从整体上思考与制定出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是国民政府抗战不可缺少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少以“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研究时段，整体上对国民政府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进行研究。基于上述思考，故选定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为题，在整体把握国民政府对国际形势发展和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认识的基础上，分析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内容及其对外政策的变化、实施等。

应该指出的是，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外交战略一词，是指国民政府有关对日或抗日外交的基本思考、基本方针；对外政策则是指在基本外交思考和方针指导之下的具体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资料多以公开出版为主。此外，前贤时俊的研究成果，以为然而有所征引者，均在注释中标明，非敢掠美；而不敢苟同者，则未予以申论，特此说明。